

新四军研究书系



皖南事变

研究與爭鳴

童志强 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皖南事变研究十年(代序)	童志强 (1)
--------------------	---------

研 究 篇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原因及其历史背景

.....	童志强 刘以顺 (21)
浅析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的“南进计划”	王荣科 (37)
论项英对皖南新四军北移方针的态度	童志强 (47)
试述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决策变化	
.....	蔡长雁 (59)
从曹甸战役到皖南事变	童志强 (64)
项英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	童志强 (78)
会攻星潭的历史考察	黄开沅 (91)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	
——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	童志强 (102)
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	
.....	黄开沅 吴长庚 郭桂兰 房列曙 (112)
皖南事变若干史实的初步考证	
.....	周祖羲 黄开沅 房列曙 (127)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两则史料正误	童志强 (136)
关于皖南事变战斗天数的考证	刘以顺 (141)
对皖南事变中石井坑突围时间的考证	刘以顺 (145)

皖南事变中叶挺被俘的真实情况

-黄开沅 房列曙 郭桂兰(147)
- 项英、周子昆烈士被害经过纪实.....徐则浩 唐锡强(151)
- 探访蜜蜂洞.....邵凯生(157)
- 项英、周子昆两烈士遇难真相
-郭桂兰 黄开沅 房列曙(165)
- 关于项英、周子昆遇害日期的考证.....潘迪友(169)
- 皖南事变中傅秋涛突围路线和率领人数辨正.....邵英子(172)
- 冯达飞被捕经过.....鲍正启(176)
- 项英被害前后和叛徒刘厚总的下落.....童志强(180)
- 刘厚总其人.....甘发俊(190)
- 皖南事变日志.....刘以顺 童志强(193)

争 鸣 篇

本来是一潭清水，为什么被搅混了？

——关于《皖南事变》创作经过答编者问

.....黎汝清(211)

究竟是谁搅混了一潭清水？

——就史学界皖南事变研究成绩问题同黎汝清商榷

.....黄开沅(236)

历史·小说·哲理

——读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断想

.....韶 华(242)

文史大手笔 皖南悲壮篇

——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花 建(245)

在历史和小说之间.....丁公量(253)

熔史学和文学于一炉

——读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曾文渊(258)

小说《皖南事变》失误谈·····	童志强(261)
《皖南事变》读后献疑·····	唐锡强(271)
评《皖南事变》代后记·····	邵英子(276)
皖南事变的历史研究存在严重弊端·····	黎汝清(281)
皖南事变历史和《皖南事变》小说·····	陈 辽(291)
叶挺请蒋解皖南之围的电文是请罪电吗? ·····	郭希华(300)
评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	甘发俊(304)
说, 还是不说	
——关于黎汝清《皖南事变》的意见	
·····	赖少其(313)
项英为什么南走茂林·····	俞 申(321)
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南进茂林地区的问题	
·····	顾伟斌 徐保琪(329)
《皖南事变》歪曲了项英的形象·····	刘喜发(335)
小说《皖南事变》与史实的出入·····	周祖羲(340)
小说《皖南事变》与基本历史事实并无出入	
——与周祖羲同志商榷·····	陈守礼(346)
历史文学的基本情节不应虚构	
——评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	
·····	黄开沅 周祖羲(358)
我要说的话·····	黎汝清(369)
力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	
——对《皖南事变》修订版寄予的希望	
·····	汪海粟(372)
谈皖南事变研究和《皖南事变》小说	
·····	何 理 张星星(382)
文学创作不能代替严谨的史学研究	
——安徽史学界皖南事变学术座谈会综述·····	
	陈丽芳(392)

对真名假事的异议

——记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皖南事变》小说研讨会

.....李 洛(397)

对小说《皖南事变》的争论.....任贵祥(405)

后记..... (414)

皖南事变研究十年（代序）

童 志 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皖南事变一直是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旨在介绍10年来国内皖南事变研究的基本概况、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不同的观点。

一、皖南事变研究的基本概况

10年来，全国皖南事变研究出现过两次高潮。

（一）第一次高潮

出现在1981年前后。

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开始拨乱反正，着手澄清在文革中被颠倒的历史。发表较早、较有影响的皖南事变研究论文是何理所著《皖南事变》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1981年，正值皖南事变40周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于5月在芜湖召开首届年会。全国9省2市280多名史学工作者和92名新四军老同志与会，围绕皖南事变进行学术研讨，交流了论文、回忆录和有关史料70余篇。会后掀起了皖南事变研究高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编辑出版了5本皖南事变的档案史料书。

《皖南事变资料选》，由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这是最早出版的一本皖南事变史料书。该书特点是以中共档案为主，同时兼顾国民党方面的

档案，还收入国共双方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多篇。出版后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不足之处是，虽然掌握了不少文电和内部档案，但因没有公布权而忍痛割爱，故辑录的史料大都系公开或内部发表过的。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全书收录了约200件中共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电。

由于该书收录的材料大部分是首次披露的档案资料，出版后引起了史学界的普遍重视。其辑录的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客观分析、所持对策，以及皖南事变过程、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反击反共逆流的斗争经过等大量第一手档案材料，为史学界深入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该书的及时出版，对掀起皖南事变研究第一次高潮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皖南事变资料选》，由安徽师范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部分史学工作者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该书特点是突出介绍国民党方面的有关档案，收录了国民党皖南事变参战部队第三十二集团军、第四十师、第七十九师、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四师、第一〇八师的战斗详报和机密日记，此外还有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团体、外国报刊对皖南事变的反映以及皖南事变大事记。

《皖南事变文电选编（国民党部分）》，安徽省档案馆编，1985年8月内部出版。

其内容主要包括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安徽省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以及第六、第八行政专员督察公署和泾县、铜陵、南陵、繁昌、宣城等县政府有关皖南事变的来往文电，全为安徽省公安厅移交给安徽省档案馆的原件。这些材料披露了皖南事变前国民党有计划制造事端，周密策划的事实，具体反映了事变发生的全过程。该书特点为馆藏资

料多，地方性强。

后两本书因偏重介绍国民党方面的档案，是对前两本书的必要补充，因此也受到识家的重视。

《皖南事变本末》，由陈枫编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作者采用资料长编的方式，向读者介绍皖南事变的历史演变过程，脉络较为清楚。

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掘出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叛徒，原新四军军部副官刘厚总1948年在重庆国民党军统局本部看守所写给蒋介石的自供状；安徽史学界也发掘出刘厚总1942年在国民党第三战区所办《宣报》上发表的反共文章《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和周子昆》和审讯刘厚总的有关文电，从而为弄清刘厚总投敌的有关情况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2. 发表了一批皖南事变研究论文。

1981年前后皖南事变研究论文的特点是数量多，史料性强。比较有影响、质量较高的论文首推以下几篇：

《皖南事变始末》，曹雁行、蔡霆光著，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马芷荪著，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写作情况的调查》，周恩来生平及著作研究组著，载《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3期；

《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黄开沅等著，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项英、周子昆烈士被害经过纪实》，徐则浩、唐锡强著，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

《皖南事变及其教训》，王秀鑫著，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3期；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发展方针的几个问题》，曹雁行、甘国治著，载《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

《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扣经过》，郑建英著，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8期。

这一阶段史学界关于皖南事变研究的主要观点可见：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1981年年会（皖南事变）学术观点综述》，童志强编，载《安徽社联通讯》1981年第14期；

《关于皖南事变问题的来稿综述》，晓君编，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

3. 撰写了一批重要回忆录。

1981年前后，原新四军中一批皖南事变亲历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撰写发表了许多很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回忆录。

最有影响的是由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联合出版的《皖南事变回忆录》。全书收录了当时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队及第一、二、三支队，中共皖南地方党领导人共计23位皖南事变亲历者，分别从各个侧面撰写的回忆录。

在有关刊物上发表的较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有：

《项英、周子昆被害纪实》，黄诚著，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

《回忆皖南事变中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经过》，李德和著，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

《袁国平同志壮烈牺牲经过》，李甫著，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1辑；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同志回忆周总理在重庆》，石曼著，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皖南突围回忆》，李子新著，载《云岭》总第10、12期；

《别了，皖南》，金冶著，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

4. 出版发行了两个集中刊登新四军和皖南事变内容的刊物。

《云岭》杂志，安徽省泾县文化局主办，主编邵凯生，1980年创刊。设有《新四军笔会》专栏，着重介绍新四军老同志当年在皖南的战斗、学习生活，以及在皖南事变中的经历。现已出到第20期。

《大江南北》杂志，上海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主办，主编徐中尼，1985年创刊。设有《皖南事变纵横谈》、《烽火征程》、《老战士专访》、《历史研究》等栏目。现已出到第26期。

这两个刊物由于内容专一，风格独特，已引起海内外史学界和新四军老同志的广泛注意。

（二）第二次高潮

出现在1987年前后。

从1984年起，皖南事变研究开始趋向深入。老同志的回忆录继续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首推钱俊瑞写于1941年2月20日的长篇回忆录《皖南惨变记》，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研究论文主要有：

《关于皖南事变若干重大史实的考证与探讨》，黎汝清著，载《云岭》（1985年）总第17期；

《论项英对皖南新四军北移方针的态度》，童志强著，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

《项英在皖南》，王辅一著，载《革命史资料》1986年第1期；

《皖南纪行》，南北著，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路线究竟是怎样确定的》，王明亮著，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2期；

《关于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功过问题》，王秀鑫著，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

这一阶段皖南事变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可见：

《皖南事变研究中的几种不同观点》，荣维木编，载《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7期；

《皖南事变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林信泰编，载《大江南北》1986年第1期；

《近年来皖南事变研究综述》，唐锡强编，载《安徽史学》1987年第2期。

皖南事变研究条件较好、力量较强的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于1986年组织省内史学界同仁成立了皖南事变专题学术研究组，在编辑《皖南事变专题研究资料索引》的基础上，决定利用安徽的优势，群策群力，把皖南事变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987年秋，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在《小说界》同年第4期发表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后面附了一篇题为《本来是一潭清水，为什么被搅浑了？——关于〈皖南事变〉创作经过答编者问》的《代后记》。小说《皖南事变》和《代后记》的发表，犹如在一泓池水中投入一块巨石，在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新四军老同志对此的反应也异常强烈，由此引发出皖南事变学术研究的又一次高潮。虽然这在黎汝清是始所未料的。

小说发表后，各地报刊争相介绍，电台纷纷播放，文艺界赞誉鹊起，而史学界的反应大相径庭。1987年11月26日，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安徽党史研究》编辑部、《安徽史学》编辑部联合召开皖南事变学术座谈会，邀请皖南事变专题学术研究组成员就皖南事变研究现状、成果及小说《皖南事变》、《代后记》进行座谈。大家一致认为，作者企图用小说来“填补史书的空缺，纠正史书的谬误”，实质上是混淆了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的界

限，小说中的许多历史知识方面常识性的失误和《代后记》对史学界、档案部门和老同志的偏见则是与会者所断然不能接受的。

应该肯定，小说《皖南事变》和《代后记》虽然存在不少问题，其对皖南事变研究的指责明显不符合实际，但是黎汝清作为一个作家，对皖南事变一些敏感问题提出了不少新颖而大胆见解，这些见解有些是很有见地的，起码为探讨皖南事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代后记》语言狂妄辛辣，也应将它看作是文学对史学的挑战和鞭挞。它激励着皖南事变研究乃至一切历史研究必须要在可思性和可读性方面多下功夫。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也先后三次召开《皖南事变》历史小说研讨会，就作者的创作态度、立场、倾向及几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塑造缺点提出严肃中肯的批评。

随着小说《皖南事变》的出版、再版，有关刊物很快就发表了一批争鸣文章和研究文章（详见本书争鸣篇）。

对小说《皖南事变》的各方不同意见，可见任贵祥的《对小说〈皖南事变〉的争论》一文，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该文在“革命历史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的关系问题”、“项英在皖南事变的责任问题”、“关于研究皖南事变的角度问题”、“关于皖南事变的研究现状问题”等方面概括介绍了围绕小说争鸣的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

这一阶段继续发表了一批老同志回忆录，比较有价值的是回忆录专辑《奔向苏北敌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该书辑录了薛暮桥等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职员和学员共33篇反映皖南事变先遣北撤、皖南事变突围和上饶集中营斗争的回忆录。

一批新四军老同志从回忆录撰写者演进为历史研究者，这是皖南事变研究第二次高潮的一个新特点。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星潭突围浅谈》，南北著，载《云岭》第16期；

《对真名假事的异议——记上海新四军研究会皖南事变小说研讨会》，李洛著，载《大江南北》1989年第4期；

《说，还是不说》，赖少其著，载《大江南北》1988年第4期；

《皖南事变纵横谈》，南北著，载《云岭》第19期；

《力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汪海粟著，载《大江南北》1989年第5期。

从1988年起，史学界开始变换研究视角，深入探讨美国对皖南事变的态度、项英的南进战略、项英与王明的关系、叶挺与项英的关系、叶挺几次辞职出走、曹甸战役与皖南事变等问题，挖掘出一批新的史料，发表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论文。

10年来，安徽史学工作者和新四军老同志在皖南事变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编纂出版皖南事变方面的书籍6本，占全国6/7（包括本书《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发表研究论文40余篇，占全国1/3（详见本书研究篇）；撰写回忆录30篇，占全国1/4。从而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皖南事变研究的进展

（一）考订了一些档案资料的错误

由于战争年代的复杂环境，造成了一些保留下来的档案文电缺损不全的现象。有的文字模糊，难以辨认；有的只署收发报当天日期，而缺署年、月，因此许多档案在编辑、发表或使用，都需要经过认真的校订。中央档案馆有关人员在编辑《皖南事变（资料选辑）》时，作了大量的细致的研究工作，考证了不少档案文电的正确时间。

此外，史学界一些同志经过研究，对1940年11月24日毛朱王

致项英电、11月29日毛朱王致叶项电及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分会书记任命及成立华中局的通知等文电的日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并否定了遗害不浅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的所谓中共中央1940年12月23日关于新四军北移路线指示的抄件，基本上获得了统一的认识。

（二）澄清了有关皖南事变来龙去脉的基本史实

10年来，在史学界、档案部门和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深入研究探讨，基本澄清了以下一些史实：

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部分非战斗人员和物资经苏南到苏北的转移路线和具体经过；

皖南新四军对几条北移路线的侦察准备；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南下无为策应皖南部队北渡的行动；

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1940年秋北渡后在江北的战略策应；

江北地方党和游击队策应皖南新四军北渡的准备工作；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军分会召开的潘村会议和百户坑会议经过及确定的行动方针；

国民党军参加围攻新四军的部队及番号；

国民党军参加围攻新四军的部队主要行动；

项英等人私自离队及归队经过；

石井坑突围作战经过；

皖南事变战斗的天数；

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朱镜我、胡荣、周桂生等人牺牲经过；

叶挺、黄诚、林植夫、冯达飞等人被俘经过；

傅秋涛、黄火星、江渭清、饶漱石、李一氓、夏征农等人和各支队突围情况；

刘厚总叛变经过；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的确切时间；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的确切时间；

皖南事变后皖南人民及中共党组织在皖南的斗争情况；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俘人员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情况。

（三）对一些问题开始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和经过情况基本上得到澄清的基础上，史学界对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国内外历史背景，皖南事变的导火线，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具体部署，新四军北移路线的确定，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惨重损失的主要教训，中共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策略，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活动及其作用，叶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功过评价等重大问题开始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三、皖南事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公布不够，影响皖南事变研究的深入进行

尽管有关档案部门，特别是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皖南事变的档案史料，功不可没，但因主要偏重于公布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以及对形势的分析，项英、军部的回电则公布得很少，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在已公布的档案中还存在技术处理过多的现象，以致改变了档案的原貌。如档案中出现的“来电”、“去电”、“××电”等凡是带有“电”的字眼，都被删改了。对公布发生于半个世纪前形成的档案，似乎不应该再存在“触电”的问题。

由于档案开放不够，给研究带来了不少障碍，造成了皖南事变研究的盲点效应。甲掌握了一件档案，写出研究文章发表后，突然发现乙的文章披露了与自己结论不同的新史料，便顿觉自己前功尽弃，纯属徒劳；甲一旦又发掘出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新材

料，又可以炮制出另一篇新作，置乙文于“死地”。这种打档案战的现象已经偏离了史学研究的轨道。如果把有关皖南事变的档案尽可能全面地公诸于世，就不致产生研究工作的盲点效应。

此外，档案分散、各自为政、互不通气的档案本位私有制，也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不便。除中央档案馆外，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军区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上海、安徽等省市档案馆，都分别馆藏有一批有关皖南事变的档案。如能打破保守观念，通力合作，统一编目，印发索引，则能为研究者查阅使用档案提供极大的便利。

（二）研究水平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研究的最终目的，应是通过历史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古为今用，启迪后人。这是宏观研究才能胜任的任务。目前的研究文章虽多，但大多系微观研究的考证文章，基本上是对过去历史现象的复原，属于复述历史的低层次研究，高屋建瓴的宏观研究文章尚属凤毛麟角。更有个别文章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以所谓披露内幕为名，故作惊世骇俗之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治学态度极不严谨。

（三）研究面窄

大部分史学工作者把研究视点投诸于中共中央和皖南新四军方面，都从同一角度来观照皖南事变，不少文章雷同、重复，缺乏新意。对日伪在皖南事变中的活动，美苏英等外部世界的反应，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国民党当局和第三战区为什么在此时此地而不在彼时彼地发动反共磨擦的直接动因，以及决策经过内情，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

（四）一些具体史实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如新四军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到底事先有没有报经中共中

央批准？再如新一支队参谋长赵希仲，不少文章说他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但其如何叛变、叛变后情况究竟如何？还有黄桥战役、曹甸战役与皖南事变之间究竟有无内在联系？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史料来加以澄清。

（五）一些研究文章篇幅冗长，语言蹩脚，可读性差。“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四、皖南事变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

10年来，史学界在皖南事变研究中澄清了不少问题，统一了对一些分歧的认识。但随着史料不断发掘和研究的深入，由于掌握史料的准确程度及研究视角的不同，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歧见。这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

近年来，皖南事变研究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尚有较大的分歧：

（一）对项英在皖南新四军任职期间功过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项英不仅是新四军东进北上“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之一，也是具体实践者”，“忠实的拥护者和积极的实践者”，“项英强调加强新四军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是主张针锋相对而不是一味迁就退让的”。

第二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以致“军部所在的皖南地区，部队发展缓慢，三年中只发展了二个团”，“一直到皖南事变发生，项英并没有表示过接受中央的批评”，“项英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一再顽固坚持其皖南特殊的错误意见”，“排挤和打击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军事指挥一再失误，在危急关头又丢掉部队放弃领导责任”，因此“对项英在皖南三年工作期间的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决不